

核心阅读

1945年5月9日，陈云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报告，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推动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因“骄傲之气”造成讲面子的不良现象，指出越是讲面子越容易丢面子，要求共产党人丢开面子讲真理。这对于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45年5月9日，在党的七大上，陈云依据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近七年期间对党的干部队伍状况的全面了解，作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重要报告。报告要求共产党人“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样就怎样”。这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骄傲之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骄傲之气”造成了讲面子的不良现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过近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根据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大略统计，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克服重重

共产党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读陈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文

□ 张荣林

困难，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华中、湖南、苏北、苏中、苏浙皖、淮北、淮南、皖江、浙东、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邱北等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域遍布华北、华中与华南19个省区，人口达到9550万以上，正规军队达91万，民兵达220万。在此情形下，党内出现了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将之称为是“骄傲之气”，这种“骄傲之气”使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讲面子的不良心理。

陈云指出，抗战爆发以来，在部分党员干部中间出现了“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他指出，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近七年的时间中，通过接触部分党员干部，发现了一种情形，就是这股“骄傲之气”使很多人喜欢讲面子，“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有功的时候他一定要居；有过的时候你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人家说他好他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对此，他严肃指出，“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是有这种倾向的”，这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的表现。

当然，对于党员干部队伍的总体情况，陈云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党内干部总体而言是好的，大部分共产党人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而且，经过延安整风后，这种状况还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他认为这种“骄傲之气”并未因此绝迹，

还在一部分干部中间存在。他还指出，军队干部的“骄傲之气”比地方干部表现得更严重，在干部中间，下级干部、中级干部、上级干部的“骄傲之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高级干部的“骄傲之气”危害大于低级干部和中级干部，因为高级干部功劳大，影响面宽，影响力也大。

越讲面子，越容易丢面子

在陈云看来，讲面子不是讲真理、讲实事求是的表现，越是讲面子，越容易丢面子，共产党人应该“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对此，陈云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共产党的党性来看，他认为，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不应把个人的面子放在首位。“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他认为，共产党人只要摆正立场，没有个人主义作祟，就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他特别指出，一个人犯了错误，有人予以指出，如果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就不会脸红，就不会不高兴。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不讲面子，党的力量就会增强很多。“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

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从个人角度看，陈云在分析错误与正确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愈要丢脸”。在他看来，如果过于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这样在分析看待问题时，就很容易将个人的利害得失掺杂在里面，很容易造成立场不正，就很难做到坚持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筋斗。愈怕丢脸，一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

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

陈云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他认为，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怎样对革命有利，怎样对百姓有利，就怎样做。他认为，要做到坚持真理，不讲面子，关键是对待自己的功劳和错误要有正确态度。

陈云指出，党员干部在对待功劳问题上，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是个人的作用。这三者的顺序不能颠

倒，如果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是人民的力量，就不是对待功劳的正确态度，就会导致出现讲面子的不良现象。首先，他指出，把个人作用放在第一位不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他还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说，如果党员个人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因此，在对待功劳时，一定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其次，他认为，对党的作用也要有足够的估计。陈云指出，共产党是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政党，它虽然犯过错误，但百姓知道它是共产主义者，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所以有时“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这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最后，对个人作用要有正确的估计。一方面应该看到个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个人作用是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一个人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还做得不错，是不是可以说，我的功劳蛮多？这样说就不适当。”

对部分党员干部在对待功劳这一问题上，过于强调个人作用的错误心理，陈云指出，他并不否定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在取得的成绩上，个人不仅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他认为，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个人也做到了十分，这种情形是

很少的，大部分的情形是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自己有缺点，或者认识上有缺陷，只做到了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比较多的。对此，他反问道，“那这里头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另外，就是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为自己有错误，缺点很多，成绩只有二分、一分，错误却有八分、九分。这种情况，在他看来，“非但无功，过错一大堆”，就更不应该骄傲了。他强调指出，“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念陈云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作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重温陈云这篇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报告，对于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走近马克思 开启大智慧

——读《走近卡尔·马克思》

□ 陈曙光

走近马克思，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也是理论研究重要的主题。欧阳辉著述的《走近卡尔·马克思》，以故事的形式、用清新的话语，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三者融为一体、交相辉映，让文章更好读、人们更爱看。

文风贴近大众。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做到不远离大众呢？说“大众话”恐怕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当前理论界存在一种“不好好说话”的倾向，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话语表达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这样的文风已经阻隔了马克思主义通达大众的道路，也疏远了大众亲近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其实，真正的创新理论首要的或主要的方面不在于引进或生造一些连自己也没有弄懂的新名词、新概念，如能在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问题上，通过研究提出自己一点真知灼见就很了不起。欣慰的是，该书文字清新，甚为好读。陈先达先生说，该书理论性和可读性都很强，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有帮助。赵家祥先生认为，该书以时代逻辑观照历史逻辑，用大众方式讲述厚重道理，一个鲜活的马克思跃然纸上，马克思的确就在我们身边。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两位前辈的评价。

主题贴近生活。“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是21世纪初的一股强烈学术动向，其大致意旨在于从马克思的文本和独特语境出发，开显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和本来意义。该书没有简单重复学界纠缠不清的某些文本问题，也避开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基本理论，而是独辟蹊径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生活主题，少了一些学术气，多了一些生活气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智慧。比如，对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幸福观的挖掘，眼光是非常独特的，观点是非常有力的，贴近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生活，对于青年学生走好人生的关键几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思想贴近文本。走近马克思，马克思的文本是绕不开的。该书不是一本构建抽象理论体系的教材，也不是一本宏大叙事的大制作，而是选取一些大众感兴趣的话题，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注重发掘马克思的智慧。该书不是一本考据意义上的著作，但丝

毫没有忽略文本的地位，相反，作者的文本意识始终摆在写作的优先地位。比方说，作者以《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共产党宣言》等为文本依据，考察马克思的职业观；以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册、马克思写给女孀拉法格的书信为依据，阐发马克思的爱情观；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为依据，阐发马克思的幸福观；以《神圣家族》等为依据，阐发马克思的利己观与价值观的关系，等等。总之，书中每一个重要观点都有文本的依据，体现了严谨的治学风格。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人生大智慧。超越感性世界的浮华，进入理性世界的深处，开启人生美好的未来，这是走近马克思的生活诉求，也是该书能传递给读者的深刻启迪。



“三注重”背后的“家道观”

——观看《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第四集有感

□ 朱康有

题。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存在家风不正、家教不严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孟子的话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强调家庭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秩序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家国情怀、家国一体，说明家与社会和国家治理具有某种同构性。他还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家训家书文化熏陶下的家风家教，都反映了“家道”的延续。家道正，人生第一粒扣子系好了，即为走向社会、报效国家打下良好根基。因此，从公民个人修身到社会、国家的价值要求是统一的。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更多地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孙中山曾经讲过：“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其实都是这样。家道之教在儒家伦理学说中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大学》中讲，“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就把家教的重要性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脱离了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后，我们进入了节奏日益加快、分工更加复杂、交往形态多样频繁的现代社会，随之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剧烈震动。但是，由夫妻和孩子构成的家庭主体内涵没有发生改变，家庭与外部仍

然存在着关系如何协调等系列问题。传统家道有些内容经过适当的转换，其中蕴含的夫妇之道、父子之道、兄弟之道、教子之道等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今社会。积极运用历史上“家”文化的智慧，对于今天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像《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文化作品至今还能发挥历久弥新的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里面容纳广阔，不仅有家庭成员立身修德、勤学好进等内容，还有如何处理好家庭成员、邻里乃至于社会和国家层面之间关系的内容。二是在传承过程中已经牢牢刻印在子孙孙孙的头脑中，称之为“家经”亦未尝不可，自然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价值威力。三是其中有些配合家文化的古训名言，还有一些家规、家戒等。比如，裴氏家风对教育极为重视，子孙考不中秀才者是无法进入家族祠堂的。裴氏家风孕育出来的“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的文武高端人才，说明什么呢？显然是充满德性正能量的家风陶冶出来。进一步追问，家道在哪里？其实还要从自身做起，所谓“身修而后家齐”。沿着这条《大学》所提示的路线，若欲深解家教之道，则又要做到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了。实际上，应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定要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体验和深刻实证，方能不疑古人之智慧、家道之精髓。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传统家教之道，把家道与群道（社会之道）、国道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对现如今将家庭同其他因素分离的倾向、造成教化层面的断裂现象具有极其重要的针对性。古老的“家国同构”观念，蕴含着智慧之“珍宝”。抗战中，一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之歌，仁人志士同仇敌忾。回想起抗

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保家卫国”激起了多少华夏儿女跨过鸭绿江的慷慨志气。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大学》一段话：“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以，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首次把“家庭美德标准”纳入干部考察范围，确定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职业道德标准、家庭美德标准和社会公德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它们可不只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认为的“家庭生活”，而关乎党的政治生活。因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首先就要从营造领导干部风清气正的家庭、家教、家风做起。



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并播出了《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第四集主题是“国之本在家”。中央党校王杰教授在解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时，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进行阐释。这一阐释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其部分内容已经收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三注重”亦作为该文的总纲出现在标题中。它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浓浓的家国情怀，揭示了家庭文明建设中的辩证思想，积淀着深厚的“家道”历史文化底蕴。

“家道”在儒家文化中究竟是个什么位置呢？儒家经典《大学》起首的“八条目”显然阐释得极为明确：如果说修身之前的条目，重点在于一己之内修，那么从“齐家”开始，将是儒家所谓“外王”事业的起点。可见，以“家道”为核心，向四周放射，能够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返之亦可“退藏于密”，潜入最隐秘的个人内心世界，所谓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也就是说，“外王”之用，一个人的内外在生命意识之体用，其实已经在家庭中展开。这个基础打不好，就会出问